

語言與哲學同行

——評徐友漁等的《語言與哲學》

● 張志林



徐友漁、周國平、陳嘉映、尚杰：《語言與哲學——當代英美與德法傳統比較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6）。

百年風雲，哲學多變，翻出許多新花樣。變來變去，仍稱哲學，理由卻在語言上。業內人士，重審歷史，多半會突顯「語言轉向」。舉例說，哈京 (Ian Hacking) 斷言：古人關注事件 (things)，近人重視觀念 (ideas)，今人強調語言 (language)。又如希爾 (Thomas E. Hill) 聲稱：古人關心存在 (being)，近人迷戀知識 (knowledge)，今人醉心意義 (meaning)。兩種說法，異曲同工，挑明一個大問題：語言對於哲學，為何如此重要？洋人寫了不少文

字，專究這個問題，有的書名乾脆就叫《語言對哲學為何重要？》(Why Does Language Matter to Philosophy?)。現在有了中國人寫的《語言與哲學》，堪稱對這一問題的認真應答。著者自己說得明白：「本書盡可能準確和全面地敘述了當代英美和德法哲學在語言問題上的思考，或者更恰當地說，以語言為原點和坐標架進行的哲學思考。」

依我看，言、思、在，向為哲學關鍵詞。不過，以下幾點卻為當今新見識：第一，對哲學來說，言非工具，而是根本。必立於言，方才談得思和在。往日諸多哲學病，幾乎都是語言病。「語言批判」、「語言治療」乃是哲學的本份。第二，細說起來，言分「語言」和「言語」，思分「思想」和「運思」，在分「存在」和「在者」。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的「語言遊戲」，奧斯汀 (John Austin) 的「言語行為」，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和塞爾 (John Searle) 的「意向性」，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的「存在論區分」等等，全都昭示着這裏的分疏。第三，立於言，則意義、指稱、真理成了哲學關鍵詞。環顧當今哲壇，無論是英美傳統還是德法傳統，都把深究語言、探尋意義作為哲學要務。比較而言，英美傳統論題集中，德法傳統風格多采。

言、思、在，向為哲學關鍵詞。不過，以下幾點卻為當今新見識：第一，對哲學來說，言非工具，而是根本。第二，言分「語言」和「言語」，思分「思想」和「運思」，在分「存在」和「在者」。第三，立於言，則意義、指稱、真理成了哲學關鍵詞。

《語言與哲學》的著者解讀了大量哲學名著，牽涉諸多典型範例，討論了一連串問題，展示了一系列進路。這些，皆可發揮引人上路運思的威力。正因如此，本書不是一本四平八穩的述評式論著，而是一本問題集中的對話式論著。在當今中國治西學者中，這是值得讚賞和提倡的。

以上三點，在《語言與哲學》中均有體現。全書「以語言為原點」，以意義為主線，論英美傳統「以問題為中心」，對德法傳統則「按人物進行介紹和討論」。在這些論述之前有簡要的歷史追溯，之後則有審慎的對照、比較、結論和展望。從全書布局和行文看，足見著者駕輕就熟的功力。最可稱道的是著者上路運哲學之思的自覺和努力。著者在比較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時明確聲言：「誠如海氏維氏同樣見識到的，哲學的首要建樹，不在於構築理論，而在於引導思考上路。」

上路，就是進入哲學。怎樣才算進入？定義並不重要，範例卻堪把玩。範例不在別處，就在哲學名著中。解讀哲學名著，便可看清路標。路標之功，一在挑明問題，二在指示進路。《語言與哲學》的著者解讀了大量哲學名著，牽涉諸多典型範例，討論了一連串問題，展示了一系列進路。這些，皆可發揮引人上路運思的威力。著者懂得海德格爾強調的這樣一個標尺：「確定的描寫哲學家們的意見是一回事；與他們深入討論他們道說的東西，即他們之何所道說，則完全是另一碼事。」正因如此，本書不是一本四平八穩的述評式論著，而是一本問題集中的對話式論著。在當今中國治西學者中，這是值得讚賞和提倡的。

讀此書，也當力做對話者，不應限於述評者。著者自陳：「本書的目標有限，但我們的期望卻非常高。因為我們深知，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學中語言的維度——它的出發點、內容和方法，實在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把住「語言轉向」，重審哲學進程，以期揭示語言哲學的「出發點」，這是著者的高明處。但是，

論「語言轉向」，竟然未見著者詳究羅蒂 (Richard Rorty) 為他所編《語言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 一書寫的長篇引言〈語言哲學的元哲學困難〉。於是乎，哲學方法對哲學立場是否可能具有中立性的問題就悄悄地溜走了。本來應該專論英美傳統的「分析」和德法傳統的「解釋」，進而對兩類哲學研究方法加以比較，以助世人上路同行。遺憾的是，這卻未成為《語言與哲學》的重要論題。可以說，該書對語言哲學「方法」的討論難見精彩之識。切合漢語語境，此點尤須強調。不懂分析，不會解釋，不管論證，不理邏輯，天馬行空，大發宏論——這些是許多哲學權威和哲學明星的成功秘訣。伴着懶惰、無知、虛偽、狂妄，哲學的確走出了書齋，變成了人人皆可隨口閒扯的玩意兒。閒扯固然輕鬆，可是未入正途。怎樣改弦更張，步入正路？不可說《語言與哲學》著者不關心這個問題，因為書中留下了這樣的字句：「為了透徹地理解中西哲學、文化的異質性和最有希望的契合部分，深入到語言之維是大有必要的。如果說我們曾因囿於自己的傳統，對西方學術思想的根基沒有深透研究的話，我們可以在語言空間中找回失落的東西。」但要說，《語言與哲學》著者忽視哲學方法的清理，實為一大粗漏。

看來，著者的注意力在語言哲學的「內容」上。全部內容都在應答如下提問：「英美和歐陸的語言哲學根本區別何在，有無本質上的共通之處，能否以語言這個共同點為契機達成具有歷史意義的融通交匯？」應該說，把任意義問理，突出語言與實在的關係，將專題考辨 (英美) 與人物追溯 (德法) 結合起來，力求

展示對話的廣度和深入，確為此書之所以超越其他中國學者撰述語言哲學論著之處。不過，根據以上提問，我認為有兩個要害問題值得深挖細掘，而本書做得遠遠不夠。具體說來，第一個問題是語言哲學拒斥、克服或解構形而上學的問題。書中有兩節專論此問題，卻隻字不提斯特勞森 (Peter F. Strawson) 和達米特 (Michael Dummett) 等分析哲學家重建形而上學的探索，更談不上將這些與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阿佩爾 (Karl-Otto Apel) 等人的工作做比較了。當今形上關切總與存在的有限性或歷史性相牽連，所以重建才特別艱巨。把住有

限性，既不墜入傳統絕對主義的深淵，又不陷進今日相對主義的泥潭——這怎樣才是可能的？此乃時代大課題。第二個問題涉及語言分析與意向分析的關係。近一二十年來，分析哲學在塞爾的示範下開始熱衷於談論意向性問題，並提出語言哲學是心靈哲學一個分支的觀點。參照德法傳統，有兩點值得追問：其一，塞爾等人談論意向性與胡塞爾等人有何異同？胡塞爾特標「本質直觀」尤須注意；其二，從哲學研究看，語言分析和意向分析何者更基本？塞爾從言語行為切入意向性應予深思。限於篇幅，不容展開，願與讀者共遐思。

我認為有兩個要害問題值得深挖細掘，而《語言與哲學》一書做得遠遠不夠：第一個問題是語言哲學拒斥、克服或解構形而上學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涉及語言分析與意向分析的關係。

跨越兩個年代——評閻步克的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 許紀霖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80年代以來，大陸史學界一直在探索傳統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可能性。儘管在形而上的觀念和方法層面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作為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最重要的還是要有經驗性的成功範例。在為數有限的範例之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閻步克所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也許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

80年代以來，大陸史學界一直在探索傳統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可能性。儘管在形而上的觀念和方法層面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作為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最重要的還是要有經驗性的成功範例。在為數有限的範例之中，閻步克所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也許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